

善用本地法懲處危害國家行為

4月15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題為「維護國家安全需要好的制度、法治、社會環境」的講話，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引人注意：「相信所有愛國家、愛香港的朋友都會形成這樣的共識，要盡快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功夫，該制定的制定，該修改的修改，該啟動的啟動，決不能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

《刑事罪行條例》絕不過時

所謂「該制定的制定」，應該是指基本本法第23條立法，本屆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有優勢，但特區政府白白錯失良機。所謂「該修改的修改」，應該是指修改現有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建立本地國安機構。而「該啟動的啟動」，相信是要求特區政府「善用」回歸前存在，經中央人民政府確認符合基本法的法例，維護國家安全。

在23條缺失的情況下，啟動（執行）本地有效的法律是避免國安出現真空的一個替代辦法。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中有數個條文是與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如叛逆（第2條）、煽惑叛變（第6條）、煽惑離叛（第7條），煽動意圖（

第9–10條）等，而用煽動意圖罪對付「港獨」言行是可行的。

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60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第9條「煽動意圖」可概括如下：

（1）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政府或香港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或（2）激起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使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或（3）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4）引起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或（5）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或（6）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7）慫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第10條規定了相關「罪行」：第一，任何人（1）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或（2）發表煽動文字；或（3）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或（4）輸入煽動刊物（其本人無理由相信該刊物屬煽動刊物則除外），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



以法論事
顧敏康

處罰款\$5000及監禁2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煽動刊物則予以沒收並歸予官方。第二，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管有煽動刊物，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2000及監禁1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2年；該等刊物則予以沒收並歸予官方。第三，凡任何人就煽動刊物而被根據第一、二款定罪後，法庭可命令檢取及沒收由下列的人管有的任何該等煽動刊物文本：（a）上述被定罪的人；或（b）命令內載明名稱的其他人（如法庭根據經宣誓後作出的證供，信納該人管有的刊物文本是供上述被定罪的人使用的）。第四，根據第三款檢取的刊物文本，須按照法庭指示處置；但在提出上訴的期限屆滿前不得毀滅該等刊物文本，或如有人提出上訴，則在上訴獲最終裁定或被放棄前，不得毀滅該等刊物文本。第五，在本條中，煽動文字（seditious words）指具煽動意圖的文字；煽動刊物（seditious publication）指具煽動意圖的刊物。

引用第9–10條處理「港獨」言行是必要的。反對派為了阻止這兩個條款啟動，聲稱它們已經過時，並認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構成必須有武力或暴力才行。按照他們的說法，只要「港獨」分子沒有真正使用武力或暴力，其言行就應該受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保護。

歐洲人權法庭判例堪引用

反對派的這種觀點是經不起反駁的。首先，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多樣性的，有分裂國家行為、叛逃行為、間諜行為、資助敵人行為、武裝叛亂行為等，其中，只有武裝叛亂行為才更多涉及武力或暴力行為；就其他行為而言，可能未必需要武力或暴力的元素也可以構成。在有的國家，故意泄露國家機密的行為也被視為危害國家行為，顯然，這種「故意泄露」的行為一般是非武力或暴力的行為。

其次，在特定情況下，只要具有武力或暴力的元素即可。2005年2月，歐洲人權法院在 Partidul Comunistilor (Nepeckeristi) and Ungureanu v. Romania 的判決中明確指出，當一個政治組織號稱使用暴力、動亂或以其他方

式違反民主原則時，就應該予以取締；在 Herri Baiasuna and Batasuna v. Spain 案件中，西班牙政府認為某個政治組織與武裝的分離恐怖主義組織有聯繫，故判處該組織為非法組織，必須解散。2009年6月，歐洲人權法院在審理該案時表明，有關組織並非必須真正實際從事武力或暴力行徑才構成國家安全，只要其號召使用暴力，或者與暴力恐怖組織有聯繫，即可認定其構成危害國家安全並宣布將其取締。

毫無疑問，各個國家或地區對有關自由權利的限制可能不同標準，皆因各國或地區存在不同情況和不同歷史傳統。例如，在德國不但不能從事「納粹」行為，不能宣稱鼓吹，甚至不能在公開場合做出「納粹」的敬禮手勢。中國在過去受到西方列強多次侵略，至今尚未實現完全統一；中國人對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有着天然的憎恨和警惕，任何企圖分裂國家的行為都是不能容忍的。

面對目前出現的「港獨」言行，特區政府唯有堅定決心和嚴格執法才是上策。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

結束語：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

——「一國兩制」漫談（16）

議論風生

蕭平

以和平方式恢復行使主權，並在回歸後總體保持平穩發展，足以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憑心而論，沒有比「一國兩制」更高的政治智慧了！

「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的制度，需要放在歷史與全局的大背景下考察。首先，要把制度與治理區分開。制度提供了社會運行的基本架構，但制度是否有效要靠治理。

香港許多問題的根源，在於行政主導受到太多掣肘，社會治理失去效率。其次，要把制度與深層次矛盾區分開。房屋短缺、貧富差距等問題回歸前就存在，有些是香港這一制固有的矛盾，與「一國兩制」無關。事實恰恰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才能在國家的強力支持下，戰勝亞洲金融危機、SARS等嚴重衝擊，鞏固和保持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回過頭看，如果當年特區政府的「八萬五」計劃（每年建造85000套住宅）能夠落實，輪候上樓還會排這麼久嗎？如果少一些內耗，把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投向經濟民生，香港發展的步伐會不會快一些呢？如果沒有港英「光榮撤退」製造的法律和政治激變，沒有回歸後外部勢力的插手干預，香港會有這麼多亂象嗎？

回歸前香港的主流民意是保持原有制度及擴大民主。中央深刻體察，以基本法

保障50年不變，並規定了循序漸進的政制發展和普選目標。只要按照基本法去做，這些目標都會實現。可是，後來出現了脫離基本法軌道爭普選，令香港陷入政治爭拗。近年來泛起的「本土自決」與「港獨」，更是對國家主權的挑戰。這些亂象，與「一國兩制」背道而馳，只會與港人的期盼越走越遠。

溫故而知新。解決香港現實問題的路徑，不是「一國兩制」改弦易轍，也非簡單的「一人一票」，而是排除內外干擾，完善治理，包括中央和特區兩個層面的治理，解決深層次矛盾，把「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更有效的發揮出來。

當年鄧小平對「一國兩制」充滿信心，今天我們仍然充滿信心。信心來自「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並有巨大包容性；來自祖國發展日新月异，「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篤定實現；來自中央強調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來自有基本法定向指航，中央和港人有智慧解決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的優勢。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發揮所長，融合發展，「不為一時之曲折而動搖，不因外部之干擾而迷惘」（習近平語），香港一定能夠續寫「一國兩制」的新篇章。

還是開篇那句話：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註：原文刊於《中國日報》

特約評論員

區諾軒「無悔意」豈能輕判？

新聞背後

文兆基

「修例風波」爆發至今已有多個月，雖在過去兩個月，黑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有所收斂，但是隨着確診個案逐步下降，黑暴似乎又有死灰復燃的跡象，近日更有消息傳出，他們打算趁着五月一日的勞動節假期，再次出來搞事。

某程度而言，香港的間歇性暴亂至今尚未平息，跟法院的審判效率及審判結果，有着莫大關係。畢竟，一個社會秩序能否維持，主要視乎不法分子會否遭到法律制裁，以及刑罰是否具有阻嚇性。假如不法分子作案過後，遲遲不獲懲處，又或者處以輕判，便會使到有意犯罪的人覺得，違法須付的代價極低，減低他們以身試法的顧慮，從而產生犯罪學當中的「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 effect）。

近日宣判的立法會前議員區諾軒襲警案，便是法官疑似有意輕判的典型案列。被告區諾軒於去年7月7日遊行過後，在旺角以俗稱「大聲公」的揚聲器向警司高振邦叫喊，令對方聽力受損，又稱呼另一警員為「殺進仔」及用咪高峰敲對方盾牌，因而

被判兩項襲警罪罪成。最終，裁判官梁嘉琪只判處區諾軒接受140小時社會服務令。

可是，根據2002年的梁俊威案，被告同樣是在警員耳邊使用「大聲公」叫喊，因而被判阻差辦公及襲警罪成，兩罪各判囚二個月及三個月，即入獄五個月。換言之，法院若是根據過往的案例，區諾軒至少應該被判入獄三個月。

「案情背景」竟成減刑因素

那麼，為何裁判官今次不根據過往案例判刑呢？根據媒體報道，梁官判刑時引述報告指，感化官形容區態度合作，有悔意並願意承擔後果，感化官對他有信心，建議判處中等程度的服務令時數。梁官考慮到兩項控罪源於同一事件，以及被告初犯、案情背景，最終判處140小時社會服務令。

令人費解的是，區諾軒在受審期間，明明是否認控罪，並且一再重申，自己沒有直接接觸事主，不能視作襲擊。感化報告又是憑什麼認為，被告有悔意及願意承擔後果？此外，

裁判官若是認為感化報告並不可信，其實可以不接納感化報告的意見。問題是：梁官認同感化報告，其理據又是什麼？

除此之外，被告區諾軒已年滿21歲，法院大可以直接判監，根本沒必要在判刑之前，索取感化官的報告。判決難免令人懷疑，梁官其實從一開始已有意以社會服務令替代監禁。問題是：為何梁官一開始便不打算將對方判監？她有考慮判決的阻嚇性嗎？

至於所謂「案情背景」，竟然能夠作為減刑因素，更是莫名其妙，甚至讓人懷疑此一判決，查實受到裁判官的個人政見影響。若非有人認同反對派的政治主張，又怎會覺得被告在當時的「案情背景」下犯案，屬於可以輕判的減刑理由呢？

由此可見，不論是根據過往案例、感化報告聲稱區諾軒「有悔意」，抑或是裁判官的減刑理由，判處140小時社會服務令，均是極不合理，有故意「放生」之嫌。律政司應該提出刑期上訴，要求法院改判監禁，才能產生阻嚇作用，從而減低黑暴再次作惡的社會風險。 時事評論員

「蘋果告急」？別上當了！

議事論事

卓銘

繼今年二月，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恐嚇記者和參與非法集結被捕後，今月中旬再因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被捕。但黎智英第二次被捕數天後，便現身拍片為「蘋果告急」，指受疫情影響，《蘋果日報》的訂閱人數由八十萬急跌至如今不足六十萬，廣告收入幾乎是零，更自言已墊支了五億五千萬苦苦支撐，呼籲讀者支持。

不知道的人，也許會以為黎智英保釋時傾家蕩產，但事實上，其保釋金不過區區二千元。再者，《蘋果日報》業績虧蝕成勢早非新聞，翻查《壹傳媒》去年的中期業績，已連續4年虧損，而且按年擴大至三億元，去年廣告收入更較前年同期急跌百分之三十四，黎智英如今才為《蘋果》告急，實在不止遲了一丁半點。

更何況，眾人皆知黎智英與美國關係非同凡響，除了曾獲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接見，其被捕後多名英美政要急急發聲譴責，實在難以想像美國會在其財困時棄之不顧。

黎智英之所以現在「告急」，除了為《蘋果》籌款外，更重要的是為反對派吹響集結號。被捕之後才「告急」，是否想把「被捕」這件事的政治

價值發揮到最大，用「悲情牌」營造自己受打壓的形象，從而最大程度爭取「黃絲」或中間派的支持？這時少不免會有人質疑筆者想太多或陰謀論，否則黎智英為何不在自己第一次被捕時便「告急」呢？

如本文開首所述，黎智英首度被捕，是今年二月之際，讀者是否還記得當時的社會環境？內地新冠疫情爆發未幾、香港陷入口罩荒、搶購潮、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拒絕「封關」的不滿，以至醫護「罷工」……當時反對派仍掌握社會政治氣氛的主動權，光是疫情本身和政府的政策，已有不少可做文章處，故不必另覓材料製造話題。

圖製造民意向政府施壓

但相隔兩個月後，情況又如何呢？過去兩日香港連續錄得零確診，雖然未到鬆懈之時，但疫情已有受控跡象，食品、口罩等民生供應亦無不穩，亂後民心思安乃正常趨勢。另一方面，黎智英、李柱銘等亂港頭目被捕；同時港澳辦、中聯辦主動出擊譴責內會郭榮鏗「拉布」，均殺反對派措手不及。

用疫情做文章已然行不通，若要

重新掌握主導權，就必須從其他方面入手。觀乎「蘋果告急」後，網上不少文宣機器發動，反對派便能藉此再度團結支持者，準備下一波攻勢，比如前天太古城的「和你唱」活動，便是前哨戰一類。

相信《蘋果》此番「告急」後，訂閱量理應有一波上升，其實這樣還有一個簡單的效果，訂閱量本身，可以被視為民意的量化。比方說，反對派能建構一個單純的邏輯：訂閱《蘋果》等於支持《蘋果》，而支持《蘋果》即等於支持反對派或反政府。假如《蘋果》之後表示訂閱量升回八十萬或更多，他們就可以說背後有至少八十萬民意支持，這不止是鼓舞自身士氣，同時也是向政府施壓，企圖為郭榮鏗等人解困，若然日後政府有針對反對派的行動，也可能會收牽制之效。雖然未必有實際作用，但終歸是可利用的一張牌。

一些人為《蘋果》財困而覺得高興，惟實際上，這遠不是結束，也許更可能是另一場暴亂的開始。但《蘋果》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訂閱人數便出現如斯急跌，是否某程度說明愈來愈多香港市民逐漸看清這份所謂「民主大報」的真面目？若然如此，則未必不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消息。

